衡阳有 2000 多年建城史，虽然很多城楼街巷已经在历史风云中消逝，但其意蕴深长的名字仍镌刻在今日衡阳的地图上，引人遐思。近日，文化学者许定国作客国学讲座，带你走进衡阳那些老地方——

“谐音”地名，一个名字就是一段故事

■本报记者 许珂 实习生 梁姬似

许定国（资料图）

遍布旧城、星罗棋布的城楼街巷，其名称既有历史变迁的痕迹，也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情。

有些地名是“自然流变型”，即在长期的时间淘洗筛选和语言异变空间相互作用下，地名“口口相传”中自然演变，原因一般是“方音”因素，有些地名是“俗雅互变型”，即因为人们主观好恶，把“俗名”改“雅称”或相反。

近日，文化学者许定国作客国学讲座，用 9 个生动的例子，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衡阳老地名的“谐音”故事。

1 “苏耽”缘何成“苏眼”，“神仙”井里有乾坤

衡阳地处江南水网地带，自古水井众多，遍布全城，仅城北向群路南头方圆不到 50 米竟有水井 5、6 口。

城南有一个“苏仙井”，俗称“苏眼井”。这里的神仙是谁？唐朝著名“诗家天子”王昌龄曾写有一诗：“昨临苏耽井，复向衡阳求”。苏耽，源自晋代葛洪《神仙传·苏仙公》。故事里，苏仙点化此井水帮助大家对抗瘟疫，一升井水调合一枚橘叶救一人。百姓感谢其恩德，就把这口井称为“苏仙井”。

汉朝以来，苏仙传说就在湘南一带流传。衡阳的南邻郴州有“苏仙岭”著名风景区。问题是“苏耽”为何又成为“苏眼”？衡阳方言念“眼”是发“an”(俺)音，如“睡着了”说“俺闭”，“睡醒了”说“俺江”。苏耽的“耽”字发音正是“an”韵母，读得久了，就同“眼”的韵母混了，成了“苏眼”。

2 “虎陷”四变成“大安”，天意难测连环套

“大安乡”位于衡阳县西 25 公里。从它的旧名到现在的名字，有四个曲折的“连环”故事。

第一个名字叫“虎陷塘”，就是在塘边挖个“陷阱”，“旧设虎陷，因名虎陷塘”；第二个名字叫“琥瀚”，作火琥声，转而习称“火暗塘”，方言读为“虎瀚”(“陷”作“瀚”音，“虎”作“火”音)；后来，人们觉得“暗”字不吉利，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名字叫“火安塘”；最后一次，乡政府在撤区并乡上报材料时，刻印章出错（或书写错误），“火安”成了“大安”。最后上级批下来——“大安乡”。

3 “蒋干盗书”引地名，名声不雅定“蒋家”

“蒋干盗书”本是“三国演义”名段，这里却用来引出了衡阳县“蒋家垅”得名来历。

同治县志载，九峰山下井干垅有古稠，高百余尺，隆冬茂蔚。垅中有大井，可灌田数十亩。从县志记载看来，此“井”并不是“干井”，那叫“井干垅”是否另有深意？

方言里的“井”发音为“蒋”，“井口”叫“蒋俺”，于是就叫“蒋干垅”，由于“盗书”蒋干名声不雅，最后定名为“蒋家垅”。传说，青年曾国藩曾在此读书，拜的塾师欧阳凝祉、娶的夫人欧阳氏都是蒋家垅的。

4 丞相停船看“相市”，衡南多“市”集贸旺

衡阳县在乾隆二十年（1755 年）分成两个县：东南成立“清泉县”，西北还是“衡阳县”，前者即今天的“衡南县”。从地名来看，衡阳县多“堂”，衡南县多“市”，后者的经济贸易较为发达。但衡南县的“相市”来历却另有玄机，是由一串的“谐音”演化而成。

第一，诸葛丞相“督赋蒸湘，常舣舟信宿于兹”(相市)。“舣舟”是停船靠岸，“信宿”是住了两个晚上。丞相日理万机，居然在此停留两夜，人们怀念操劳的丞相，“建祠于江皋，名‘相公浦祠’”，诸葛丞相被简称“相公”。第二，“浦”是江边高地，人们谐音称为“堡(pu)”，此地就叫“相公堡”。第三，周边相邻的十多个乡镇(村)都叫“市”，如茶市、蒸市、茅市、铁市、隆市、冠市等，都与集市贸易、特色产品有关。相公堡物产历来富饶，于是就有人将“相公堡”也改名为“相市”，后来果然集市旺旺，工贸农特百业兴旺。

5 衡阳“堂”里谐音趣，“焉知”讹变成“胭脂”

与衡南县稍微不同的是，衡阳县地名有不少“堂”，均散发着传统文化底蕴魅力。如古典文化典籍类的“九思堂”(西渡镇海垅村万氏)、“三元堂”(科考连中三元，岘山镇三元村刘姓)、“盘谷堂”（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洪市镇盘谷村）；如富于哲理意味类的“四维堂”（“礼义廉耻”，井头镇孟山村）、“留孝堂”（曲兰镇湘西村）、“慈德堂”（石市镇石狮口），等等。

在衡阳县，还有不少由乡俗方音演化的地名。如，演陂镇的“桑林”因方言里的“桑”发音为“双”，定名为“双林”；栏垅乡“窑湖”来于乡俗婴儿摇篮“摇窝”音；岘山镇有个“碧崖山”，村因山得名，方言里的“崖”读如“俺”，同“眼”字类似，于是“行旅者音讹谓‘闭眼山’，土人甚讳其称，妇幼辄正其音”（同治衡阳县志）；溪江乡马山村有个“焉知堂”，语出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”，有期盼后代兴旺涵义，后被讹变为“胭脂堂”。

6 “马楚”大王在“铺路”，“疑冢”原在“上潢水”

在衡阳城北有个“马王巷”。“马王”是唐末“五代十国”的“湖南楚国国王马殷”（852—930 年）。出身木匠的马殷投入战争，创立了至今公认的古代最复杂的“马楚兵制”，扫平湖南地方群雄，“楚王殷始建国，立宫殿，置百官，皆如天子”。马楚全盛时辖湖南全境、广西大部及贵州东部广东北部，领 24 州 5 节镇。有研究资料提到“908 年，马殷亲至衡阳县籍田，截上潢水筑堤为塘，灌溉数千亩，并“自选墓址水侧马王山”。因此，由于一个地名的谐音，让后人找到了“马楚疑冢”。

衡阳县“樟木寺”有棵二人合抱“荆树”，方言里“荆”“樟”谐音难分，就都叫“樟”。乡政府就在“上潢水”畔的“白露坳”。1983 年文物调查，本地民众说“楚王马殷墓在白露坳龙头坪，坟堆有一米多高，107 国道改造时夷平，墓在路基下”(引自 2013 版衡阳地方志)。

7 “倩女幽魂”在衡阳，千古绝唱“下潢水”

“上潢水”有“英雄冢”，“下潢水”则有“儿女情”。

衡阳方言里“上”“下”有些谐音不分。在考究“上下潢水”时知道“上潢水源出佝偻峰屈曲流六十里，离城东北又有下潢水”，往南一里有“九渡铺”，就是今樟木乡九渡村，这也是中国人熟知的“倩女幽魂”凄美爱情故事发生地。

唐传奇的《离魂记》，就记载了衡阳美女“张倩娘”与男友王宙“生死恋”故事。《离魂记》中的“倩娘”勇敢冲破社会，家庭压力，更浪漫地冲破“身体”束缚，以“灵魂”奔向“九渡铺”，“忽闻岸上一人行走甚速，乃倩娘徙行跣足而至。”且语之凿凿，深情倾诉：“将夺我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，思投身奉报，是以亡命来奔”。从此，衡阳“倩女”美丽坚贞、勇敢无畏形象就“定格”在“下潢水”潺潺清流中。

8 仙山仙女仙镜台，谐音竟然是“正当”

纵览衡阳各地山川地名，很多地方出现了“仙山”“仙女”的传说。特别是“耒阳”，在城东南四十里地面就有四座“仙山”，分别是沙明乡王峰仙、五峰仙、南阳镇天门仙、上架乡候憩仙。

耒阳地名志 47 个地名，就有十个“仙”。其中，“谐音”得名的有坛下乡的“蔡下仙”(“寨下山”谐音)、磨行乡的“主仙岭”(有人中举得名“举仙岭””)。而衡阳县关市镇“正当山”的谐音得名却有些怪：话说此山西面有个圆洞，远望犹如一面圆镜，传说是“仙女梳妆镜台”。可是“镜台”在方言中流传竟成了“正当”，源本“正”的方言发音为“进”(jin)。于是，“镜台山”就变成“正当山”，村也叫“正当村”。

9 “车江”为何读“掐光”，古音方言活化石

衡阳方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，其中蕴涵保存了一些“古音”，如衡南县“福全岭”原是“浦船岭”，“船”古音是“quan”。衡南县“车江”镇，方言念为“qiaguang”(掐光)。唐宋时有转音为“qia”(掐)，“江”字在《唐韵》说是“古双切”，音“gang”，可读“光”。同理，以“工”字注音的如“缸，扛，杠，汪，江”等都是“ang”韵母。

衡阳方言把“江”念为“光”，“车江”读如“掐光”，正是古音方言活化石一例。

用典释义

三命而俯

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。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饘于是，鬻于是，以糊余口。

——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

■译文

接受权位的册命，一命时欠身前倾，二命时弯腰鞠躬，三命时俯身如弓。作为有权者，平日走路也不是大模大样，而是顺着墙根小步快走；谦恭而行，也没有人敢对我加以侮辱。用这只大鼎煮米，用这只大鼎熬粥，以此来度日糊口。

■解读

最早记录这段话的文献是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。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，把这段话铸在了家庙的鼎上，作为铭训，其中心含义是权位越高，做人的态度就要越谦恭，生活的需求就要越俭朴。这是一种从政为官的智慧。正考父曾经辅佐过宋国三代国君，是三朝重臣，但是他始终都能够保持谦卑自省。

2013 年 6 月 28 日，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引用过这段话，意在告诫党员干部牢记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，要在工作中敢作敢为、锐意进取，在做人上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。这一番话，语重心长，有着很强的针对性。现实中，有的干部“一朝权在手、便把令来行”，有的干部“前门当官、后门开店”，有的干部“一人得道、鸡犬飞升”……凡此种种，最终他们都在肆无忌惮、滥权妄为中坠入了腐化堕落的深渊。

“饱满的稻穗总是谦卑地低着头，空瘪的稻穗才会高傲地仰着头”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要时刻保持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”的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常想“当官为什么”“用权干什么”，以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态度用权，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经典品读

古代监察官的“诗意”情怀(下)

有宋一朝，建立在五代十国割据的混乱局面上，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对监察制度进行了改革完善，《宋史》有云：“考宋之立国，元气在台谏。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宋代涌现出了一批勇于任事的监察官。

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的北宋官员包拯，他一生“不爱乌纱只爱民”，赢得了世人的敬仰。包拯担任过监察御史、右谏议大夫，还做过御史中丞，由于宋代御史大夫并不是真正的职事官，所以御史中丞才是宋代御史台实际的长官。包拯在历史上并不以文墨著名，仅流传下来了一首诗，但这首诗却鼓舞了许多人，此诗云：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毋贻来者羞。”这是包拯为官做人的原则，清心是治身之本，正直是做人之道，倘能做到这两点，便有望成为“秀干”一样的栋梁之材。

曹修古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 年）的进士，曾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担任监察御史。宋仁宗时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建塔庙的风气，皇家也打算营造金阁，又下诏书去交趾国采购翡翠玉石，身为御史的曹修古对其奢侈耗费力言不可，奏请罢免。曹修古为人一生俭约，洁身自爱，死时贫困不能归葬，同事好友以银两赠其妻女，妻女知曹修古以忠节闻名天下，谢绝不受。《宋诗纪事》中收录了曹修古的两首诗，其中一首为《题清心堂》：“天府鞠囚三节日，霜台待漏五更时。薰风一觉清凉睡，莫问浮名高与卑”，读之颇觉为人正直的曹修古亦不乏魏晋名士的风度。

宋徽宗宣和三年（1121 年）进士榜中有一位刘一止，也曾做过监察御史，正直敢言，因为忤逆了奸相秦桧而落职。刘一止以一首《晓行》词名著京师，上阕云：“晓光催角。听宿鸟未惊，邻鸡先觉。迤逦烟村，马嘶人起，残月尚穿林薄。泪痕带霜微凝，酒力冲寒犹弱。叹倦客、悄不禁，重染风尘京洛。”晨光薄雾里，远村晓烟迷蒙，构成了一幅晓行图，此行何往，目的地正是京师，透出离家之后前路茫茫的辛酸。刘一止另有一首小诗《小斋即事》：“怜琴为弦直，爱棋因局方。未用较得失，那能记宫商”，爱琴不是为了听音，而是为其“弦直”，爱棋也不是为了对弈娱戏，而是因其“局方”，这首小诗借物咏志，又别出心裁，咏的正是刘一止自己清直方正的志向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国学教育

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二

活字印刷术

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·摆书图》，图片选自张秀民著、韩琦增订《中国印刷史》

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新，其基本方法是预制大量独立活字(阳文反字)，组合排版，涂墨覆纸印刷，拆版之后，活字可再行重排。

11 世纪中叶，毕昇发明胶泥活字，排版印书。按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北宋庆历年间，布衣毕昇以胶泥刻字，用火烧坚，制作众多活字，在带框的铁板内排字成页，加热板上“松脂、蜡和纸灰之类”，以固定活字，压平字面，即可刷墨印纸。“若止印三、二本，未为简易，若印数十百千本，则极为神速。”1193 年，周必大参考沈括之说，用胶泥活字印行《玉堂杂记》。13 世纪中期，姚枢教其弟子杨古“为沈氏活版”，印行《近思录》等书。

13 世纪末，木活字与金属活字均已出现。王祯《农书》附载《造活字印书法》，提及前人有“烧熟瓦字”(泥活字)，“近世又有铸锡作字”(锡活字）排印书籍，继而介绍了自创的木活字印刷方案，以轮盘分格，按韵部储字，提高检字效率。1298 年，王祯纂修的《旌德县志》便用此法印成。大约二十年后，奉化知州马称德制成十万木活字，印行《大学衍义》等书。传世西夏文佛经活字印本与元代回鹘文木活字，见证了活字印刷技术的跨语言传播。13 世纪—14 世纪，朝鲜半岛也开始制造汉文活字印书，《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》可能是现存最早带有年款（宣光七年，1377 年）的汉文金属活字本。15 世纪后期欧洲兴起的金属活字印刷，机械化程度高，工艺自成体系，但基本方法与古代中国活字印刷术并无二致，有可能受到后者的启发。

明代木活字印刷书籍可考者百余种，其中金属活字本可考者约六十余种，其中 16 世纪初无锡华氏、安氏印本约占三分之二。18 世纪，清朝官方大规模采用活字印书，康熙末年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（铜活字本）与乾隆年间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(木活字本）是其代表。乾隆以降，民间活字印书（木活字为主）较前代更为盛行，报纸（如《京报》)、彩票、家谱亦往往选择活字排印。

就书籍出版而言，传统汉文活字印刷技术要求高、书版难以保存，相对雕版印刷并无全面优势，长期处于次要地位。19 世纪以降，西方近代印刷技术东渐，随着印刷机、铅活字、电镀字模、纸型等新设备、新技术的应用，汉文活字印刷实现了技术突破，铅字排版印刷在 20 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旷深本：

治军严谨，勤行不怠

旷深本（1703—1762 年），字资安，号槛泉，清湖南衡山县(今南岳区）人。幼年臂力过人，承家训攻文习武。雍正二年(1724 年)，以童试第一人武痒(学校）就学。两年后，应武科乡试，中武解元，时年仅 24 岁。雍正八年（1730 年）进京会试，中武进士，分发江西为候补守备。当时，制军赵义爱惜其才，委任为九江中军都司，后历任掌饶州、樟树、建昌、南安、永丰、赣州、永新、铅山、袁州等营军务。

旷深本治军严谨，勤行不怠，战功卓著，为国征战立下汗马功劳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 年），任陕西阳平关完备期间，辖区内平静无事，井然有序。次年，四川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作乱，他随傅恒入蜀平息战乱，后授封为武德将军，并诰封三代、袭爵，留守甘肃。

镇守甘肃期间，旷深本治军爱民有方，深得民众爱戴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 年），他奉甘肃都统命，安抚金厂、巴里坤等部落，维系了甘陕西边界的安宁。朝廷嘉其功，进封怀远将军、山丹游击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 年），转调江西建昌总兵府。临行时，甘陕军民特制“万民伞”送他到建昌任所。同时，还为他建了一座石牌坊，镌刻“兵戴民怀”，以颂其功德。

旷深本为官清正廉洁，洁身自好，率先垂范，革除陋习。当时，建昌地区有一惯例：凡盐铺、当铺，每季须向各衙门缴纳税外的贿银，名曰羡余。他对此深恶痛绝，立即带头拒受这项贿赂，并张榜通令所属州衙门，取消了这项陈规陋习。

旷深本一生戎马，勤于公务，之前从未携带家小，与家人聚少离多。直到任职建昌后，因年届花甲，妻儿才相随。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 年），病卒于建昌官署，享年 60 岁。同年，其遗属扶柩还乡，归葬南岳老家，其古墓至今尚存。

（记者胡建军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）

衡阳历史文化 小辞典 人物系列㉛

杜甫夔州以后诗

宋人作诗热衷于学习杜甫，黄庭坚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他最乐于称道的，是杜甫“到夔州后诗”，也就是杜甫在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逗留时写下的作品。黄庭坚赞叹“夔州后诗”的时候，他想到的，其实是《秋兴八首》《咏怀古迹》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，但事实上，这些名篇名作，远不足以呈现杜甫夔州诗作的总体面目。离开成都之后，杜甫经过一番辗转到达夔州，在这里居住了接近两年的时间，创作了四百余首诗歌，相当于他流传至今的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。

杜甫初到夔州的时候是初夏，又逢旱年，想必为这里的酷暑所惊骇，一连写下许多题目中就带着“火”“热”“毒热”等字样的诗歌，好不容易有雷，却是“大旱山岳焦，密云复无雨”，偶尔“晚加小凉”，能够“稳睡”一会儿，便欢欣地开始“论壮年乐事”。炎热天气让人无法思虑，身体的不适遏止一切的情绪波动，喜悦自然不能，沮丧也有些顾不上，杜甫在这种天气里仍坚持创作。

经历了酷热之后，便是雨水。雨带来清凉，可下久了也让人觉得沉闷，雨停后也难得见到太阳，终日里阴阴沉沉，只好眼睁睁看着江水清了又浊，浊了又清，最后，连做梦也是澌澌湿湿的。当年的杜甫为这种天气所困，集子中接连出现了《雨》《雨二首》《雨不绝》之类的题目。身为士大夫的一员，杜甫面对百姓之时总能欣赏其质朴，悲悯其生活。

在夔州的日子，其实已经算是杜甫的晚年。杜甫能相对安顿下来，此时的交游，也比在成都时少了许多。因此，他有时间来创作。诗集中排在一起的一些诗，从题目上就可以推测他这时的生活究竟是何种状态。比如，有一天他早上写了首《晓望》，傍晚写了首《日暮》，接下来又写了《暝》《晚》《夜》，像是一天都坐在一个地方，静静看时间流过，只是与常人不同的是，他随时能够从这逝去的时间之流中，打捞出一些东西，转化为诗。

就在这些时光里，杜甫成批成批地写作诗歌：总结致乱之由、得失之故，评骘名公大臣的功过是非，回忆早年的壮游交往，总结一生的诗学源流，吟咏眼前的动物植物、风云月露，当然仍旧没有忘记报效朝廷。夔州两年成为他个人创作史上的又一高潮，特别是律诗更是在此时臻于化境，在涵咏那些名作的时候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各式各样的生活细节，可以窥探他或大或小的情绪变化。沉实高华、包囊古今的大制作大手笔，值得钦佩，同时对于诗歌而言，尽量捕捉丰富具体的生活经验，从平淡无奇的日常中提炼诗意，并将其转化为扎实有力的诗歌语言，也需要相当的功力。杜甫在夔州时的这类作品至少可以告诉人们，诗歌与生活可以紧密地融合在一起，写作，可以是一种别样的存在方式。

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